



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

主编 丁柏铨

副主编 杜骏飞

冰点

BINGDIAN

9

周海燕 著

调查性报道 采访与写作

新华出版社

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

周海燕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周海燕著 .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6

(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

ISBN 7-5011-6182-8

I . 调… II . 周… III . ①调查—新闻采访②调查—新闻写作

IV . G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7394 号

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

周海燕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hs. 126.>

中国新闻书店:(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72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一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182-8/G·2255 定价: 2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总序

总序

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崭新的知识系统，新闻传播学研究在近100年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尽管新闻学与传播学存在着学科属性上的差异，但它们在知识上同步增长的关联性仍然极为显著，这即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通常被指称为同一学科的原因。

在中国，自1834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以来，新闻学研究即开始了它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最初的学科启蒙，马列思想的传播，苏联研究模式的盛行，“文革”，“文革”后的恢复，西方学说的绍介和学术研究的中国本土化。至于传播学，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Mass Communication”的概念即已被引入国内，但真正意义上的探索传播学理论，则仍然迟至“文革”后才得以开始。

约20年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包括实务研究、理论研究及方法论的探讨，包括绍介西方学说与自我学术发明，包括报刊研究、电子媒体研究与新媒体研究，包括分项课题与跨学科、边缘学科课题……均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显而易见的是，学科发展的速度，仍然远远跟不上新闻传播实践与新闻传播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日千里。其中，最为典型的表征即是：对大量国内外前沿性知识课题始终缺乏某些必要的知识整理与学术建构。这种现状，无论是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还是对于学科本身的成长，都是一种不应有的缺憾与妨害。

本着上述观念，本丛书在此着力推出一系列有关新闻传播学的前沿性课题成果，力求在理论的“出新、补缺、深化、整合”上下功夫，为学界及广大新闻传播学读者着意营造新意迭出的学术氛围，并殷切期待着学者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编委会
2001年10月于南京大学

序 言

新闻学的课题源自新闻人与现实的直接对话。本书有关调查性报道的探讨亦是如此。它是作者多年来作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双重思索的结果。

身处这个经济和文化全面转型、社会变动剧烈、而信息传播又全面提速的时代，公众每天都在遭遇大量的新闻。那些闻所未闻的事件，都在以图像、声音、文字等不同形式涌到我们的面前：司法腐败、经济犯罪、道德失范、环境恶化……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受众在震惊之余，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冗塞的信息传播中，是否还有我们不知晓的重大事件？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对于我本人会有什么影响？

作为媒介，作为公众的代言人，记者不仅有义务报道那些已轰传街巷的新闻事件，同样也有责任去调查那些隐藏在生活浮沫之下的、更为深刻严峻的社会问题，追问其法理所自、根源所在，以求标炳公正、彰显正义。换言之，他们更少作为记录者，而更多地作为思想者出现在公众面前。

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出现，正体现了世界新闻业的这一总体思潮的演进。它使众多优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尝试以手中之笔，去担当“政府镜鉴”和“社会守望者”的重大职责。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

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

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在所有的语词中，没有哪一种形容，比这更符合调查性报道的意义。

并且，作者以为，在一切有关新闻业务的探讨中，也没有哪一种工作，会比探讨调查性报道的理论与实践更为激动人心。

目 录

总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调查性报道：总体分析	(1)
第一节 调查性报道的观念与历程	(1)
第二节 调查性报道对新闻文体的贡献	(39)
第三节 调查性报道在中国	(46)
第二章 调查性报道的采访	(61)
第一节 预采访	(61)
第二节 面对面	(72)
第三节 证据的力量	(102)
第三章 调查性报道的写作	(116)
第一节 谋定而后动	(116)
第二节 报道的结构	(133)
第三节 风格	(154)
第四章 法律风险的规避	(161)
第一节 调查性报道中常见的法律风险	(161)

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

第二节 规避风险的步骤.....	(202)
第三节 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	(212)
第五章 调查性报道分类例说	(235)
第一节 官员的违法和违规行为	(235)
第二节 司法腐败	(246)
第三节 有组织的犯罪与黑社会	(259)
第四节 农村和农民	(266)
第五节 环境问题	(275)
第六节 财经内幕	(281)
第七节 消费纠纷调查	(298)
第八节 文艺和体育报道	(307)
附录	(321)
主要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0)

第一章 调查性报道：总体分析

第一节 调查性报道的观念与历程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期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①

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它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正如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

^① 有关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很多，参见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15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493页，新华出版社，2001。

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

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①它们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如果不是有敏锐嗅觉和强大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出数十倍的努力，将其揭示给受众的话，也许永远不可能公诸于世。记者们这么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新闻界的一项基本理念——也许，称之为美好理想更为确切——即保卫公众利益，利用传媒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当然，能够为所在传媒赢得声誉，也是媒介和记者对其倾注巨大热情的重要原因。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美国，其发展的历程，在新闻事业史上可谓源远流长。

17世纪70年代，美国的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开始对社会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丑行进行揭露，包括政治活动的内幕、政府的贪污腐化、公司企业的营私舞弊行为、犯罪集团的活动等。不过，这一时期的报纸毫不掩饰自己的党派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报道往往更多地是攻击持不同政见者的武器，而非公众的喉舌。

19世纪后半期，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开始鼓吹社会变革，鼓励大众同政府和巨商的贪污腐化作斗争。他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强调报纸应揭露贪污腐败。他说：“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为社会谋福利，发表独家新闻。……我们的报纸每天至少要有一条独特的新闻，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②

普利策素有“喜欢秘密行动”之称，在他接手《圣路易斯邮

^① 沃尔特·福克斯著：《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153页，新华出版社，1999。

^② 道格拉斯·贝茨：《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69页，新华出版社，1993。

报》的第一年，该报就先后鞭挞了煤气公司的欺诈行为、彩票的骚乱、运货马车的垄断和保险公司的欺骗。1883年5月11日，普利策在《世界报》创刊号上发布《告读者书》：“在这个日益发展的大都市里，这样的一份报纸是有用武之地的：它不仅便宜，而且明白易懂；它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容量巨大；不仅容量巨大，而且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当有钱有势者的奴仆；……揭露丑恶的欺诈现象，鞭挞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真挚地、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和战斗。”^①

20世纪初，一场被称为“Muckraking”——也就是“扒粪运动”的黑幕揭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时，美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各类社会问题如政府运行效率低下、官员腐化、贫富阶层两极分化、福利制度极不完善、种族歧视严重等等层出不穷，一些杂志记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尝试用一种更加主动、更加深入的报道形式来揭露和批判这些现象，分析其成因，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期推进社会的变革。1903年，林肯·斯蒂芬斯撰写的《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撰写的《美孚石油的历史》以及雷·斯坦纳德撰写的《工作的权利》相继发表，三篇报道分别揭露了市政腐败、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煤矿业残酷镇压工人罢工的情况。由于迎合了当时美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黑幕揭发运动逐渐开始兴盛。^②

1905年，《柯里尔》杂志揭露了不法商人在药物和食品里掺假的报道，这直接促成美国通过了食品和药物纯洁法，使公众对调查性报道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据统计，1900—1915年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000篇文章，其内容涉及美国社会

① W·A·斯旺伯格：《普利策传》，380页，新华出版社，1989。

② 刘明华著：《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1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的方方面面。

由于难以忍受记者无休止的诘问和追逐，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当面怒斥记者“专挖丑闻”，并轻蔑地把他们称为“扒粪者”(muckraker)，这个不雅的称号来自于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人物，他从不抬头看天，而只是热衷于用铲子捡拾地上的污物。但新闻界的观点则与罗斯福针锋相对。他们不仅高兴地接受了“扒粪者”这一称呼，还争辩说，在美国这样一个机构庞大、运转复杂的国家里，没有深入的调查性报道，公众就无法监督政府可能产生的腐化和不法行为。

20世纪70年代，调查记者们由西方新闻界习称的(Investigative Reporter直译而来——笔者注)关于五角大楼、越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揭露把调查性报道的声誉推上了顶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根据在水门办公大楼里发生的一宗普通的人室行窃案中发现的线索，一直追踪到白宫。新闻报道引发了国会的调查，最终导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职。^①“水门事件”成为美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大事件。记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一举成名，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这使得调查性报道一时间风靡整个美国新闻界。

新闻界在水门事件期间的表现有力地说明，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它所能为社会提供的最佳服务，就是代表公众对权力进行监督。调查性报道促使公众关注重大议题，也加快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尽管直到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中才增设了“调查性报道”这一奖项，但这丝毫无损于调查性报道的巨大荣光。事实上，近年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新闻报道中有极大一部分是以揭露丑闻

^①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展江主译，511页，新华出版社，2001。

为主的调查性报道。1918年《纽约晚邮报》记者哈罗德·A·利特代尔以揭露新泽西州监狱滥用职权的报道而获“报道奖”，这是最早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性报道。^①根据笔者对普利策新闻奖历年获奖报道的统计，在1992年之前颁发的580项新闻奖中，调查性报道共摘取了40%的奖项。2002年，《华盛顿邮报》的霍维茨、希格哈姆和科恩的系列报道，揭露了在1993年和2000年间229名受监护儿童因疏于照料而死亡的事件中哥伦比亚特区的责任，报道促使该市对儿童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因此而获得“调查性报道奖”，而《纽约时报》在“9·11”恐怖袭击后以特别版面定期报道这起悲剧性的事件，结合运用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的手法，对当地和全球事态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刻、连贯的调查及分析，获得“公共服务奖”等一系列奖项，成为该年度普利策新闻奖的最大赢家。

目前，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报道、客观性报道鼎足而立，成为美国新闻界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流流派之一。专注于调查性新闻研究的调查新闻学（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也应运而生。美国还设有“调查记者与编辑组织”（Investigative Reporter and Editors, inc. 简称 IRE, <http://www.ire.org/>），该组织是由美国具有丰富调查性报道经验的知名记者和编辑组成的，它不仅提供对调查记者的职业训练，还协调协会成员行动，组织大规模的调查性报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美国还设有“调查性报道基金会”，专门为调查记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在其他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印度，派记者冒充军火商人揭发政府高官受贿行为的网站一夜成名；在法国，揭露血液污染案的记者被视为英雄；英国“疯牛病”的报道者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动荡不安的非洲，尼日利

^① 《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69页。

亚记者也以其对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的美誉；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帮助揭露了卢泰愚总统的受贿行为，导致其下台和入狱；在日本，《文艺春秋》记者立花隆执笔的《田中角荣研究》成了田中内阁垮台的导火线；澳大利亚报纸对于霍华德政府几名部长多领差旅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德国新闻媒介对科尔政治献金丑闻也作了深入的报道……

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已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一、调查性报道的两大类型

调查性报道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1. 揭露性报道

这类调查性报道的重点是揭露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经理以及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和丑闻。采写这类报道的调查记者，一般是根据日常新闻中发现的蛛丝马迹，或根据群众来信和内线关系提供的秘密消息，进行或公开或秘密的采访和调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记者必须独立寻找新闻线索，跟踪追击，获取证据资料以求达到最终的准确判断^①。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独立记者西摩·赫什对美莱大屠杀的报道以及《民主党人与资本》记者对海洛因毒品运输的调查，堪称揭露性报道的扛鼎之作。

在中国，近年来，揭露性报道在内容上日益深刻，在文本表现上亦日趋成熟。下面这篇新华社记者对郴州体育局赌球丑闻的报道，可以视为当前国内报纸新闻中揭露性报道的一个典型样

^① 参见陶涵：《新闻学传播学新名词辞典》，5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本。

新闻调查：郴州体育局赌球事件真相^①

从事非法赌球活动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作为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有责任及时制止。然而在郴州6·25赌球案中，当地体育局却置国家有关法律于不顾，带头“坐庄赌球”。

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郴州市体育局为什么公然违法呢？新华社记者日前赶赴郴州进行调查。

体育局长的“探索”

郴州市原体育局局长邓国贤是这场赌球风波的始作俑者。这位48岁的中年人，虽然正接受组织上的处理，内心还是有点想不通：他的初衷是全身心为体育事业筹措资金，怎么最后会演变为“典型的、特大的赌博行为”？

2001年9月上任的邓国贤，原是市广播电视台副局长。调任体育局后，他积极申办湖南省第十届省运会，同时筹办全国五城会的排球比赛，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带动郴州体育设施的建设，从而迎来郴州体育事业的腾飞。可经费不足却让他饱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尽管郴州市的财政收入在湖南仅次于省会长沙，但市体育局机关一年的财政拨款不足50万元，并且还累计欠各种款项420多万元。整个体育局除了每年收取20多万元的门面租金外，别无其它收入，而这笔租金收入还不够还银行的利息。

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在邓国贤的积极倡导下，经市体育局党组集体研究，市体育局决定从外地引进一个叫“体育竞猜”的经营项目。记者了解到，引进这个项目最初并非是邓国贤的创

^① 《中国体育报》第一版，2002年7月19日。

意，在其上任之前，市体育局于2000年6月9日，专门就此项目向市政府进行了请示。

记者在这份标号为28号的公文处理单的复印件上看到，处理意见一栏中，郴州市一位领导在2000年7月13日的批示意见是：可先行试点，请相关领导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

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这个项目拖至邓国贤上任才正式开始实施。据了解，为稳妥起见，2001年1月18日，市体育局又专门组织人赴外地考察，考察组回来后，又专门向体育局党组递交了一份书面考察报告。据邓国贤说，今年3月，他又专门向市政府和市人大做了汇报，相关领导对这一探索行为均表示了支持。就这样，性格外向、思想活跃的邓国贤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

“探索”为何走偏方向

郴州市体育局的“探索”为何滑落入赌博陷阱？郴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认为，“探索”本身没错，错误的是探索者在探索的过程中，没有分清法律原则和具体方法的区别。

受郴州市委、市政府委托，曾锦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对于市体育局的这种“探索”行为，郴州市委、市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失察”的责任。但他同时说，市体育局的请示汇报材料并没有附相关的具体做法，只是请示了一种想法。

其实，邓国贤的探索初衷是没有错的，市政府支持探索的批示也没有错，错误的是执行者在探索中的具体环节，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规；监管者在探索者违规时，也未能及时行使自己的职责，最终导致“探索”缺乏约束，探索者也由此走向赌博的深渊。

公安机关的调查显示，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在成立之初，就已违背了国家的有关规定。2002年4月，郴州市体育竞猜俱乐部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义在民政部门获得批准。而按照国家